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程鹏万 著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程鹏万 著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 / 程鹏万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25-8568-7

I. ①简… II. ①程… III. ①简(考古)—格式—研究—中国②帛书—格式—研究—中国 IV. ①K877.5
②K87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0569 号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

程鹏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40,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568-7

H·178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得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
‘出土简帛格式整理与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
的资助，谨致谢忱。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简牍格式	008
第一节 简牍称谓、种类与简牍材质	008
第二节 简牍修治	029
第三节 简牍编联	041
第四节 简牍长度	079
第五节 简牍的缮写	113
第六节 简牍题记	140
第七节 简牍符号	178
第八节 简牍容字	231
第九节 简牍收藏	241
第二章 帛书格式	258
第一节 帛书概述	258
第二节 帛书选材与缮写前的处理	261
第三节 帛书的缮写	266
第四节 帛书收藏	287
第三章 检署格式	290
第一节 检署定义	290

第二节 封检类型	294
第三节 检的封缄	302
第四节 题署	308
附录一 简牍帛书标题一览表	309
附录二 简牍格式一览表	344
附录三 帛书格式一览表	389
引书简称对照表	398
参考文献	403

绪 论

一、简帛格式内容

简帛格式是指以简牍、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古代书籍^①的格式,或称简帛制度、简帛形制等。简帛格式包括简帛选材、修治、长度、编联(帛书不需编联)、缮写、题记、符号、容字和收藏,以及与简帛相关的检署格式。

二、研究简帛格式的意义

研究简帛格式可以加深我们对古代书籍的了解。“我国古代书籍源远流长。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

^① 简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古书。古书即历代史志著录的“书”,古人叫“艺文”或“经籍”。据《汉书·艺文志》古书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律令,依《隋书·经籍志》归为古书。二、文书。文书指的是作为档案或文件的“书”。三、丧葬文书。丧葬文书是指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的清单,与文书中的簿籍类近似,参看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第70~75页。或称之遣册、物疏、器疏等,参看洪石《东周至晋代墓所出物疏简牍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1年第9期,第59~69页。我们为叙述方便,将丧葬文书分为遣册和遣牍两类。

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至少到春秋时期,又用白色的帛作为书写材料。此后,书于竹帛就成了大众的常谈。不过,早期的简牍书籍究竟是什么样子,学者只能由文献记载去推测,不免有不少失实的地方。”^①我们通过总结出土简牍帛书的格式,结合传世文献探讨先秦两汉书籍格式,可以大大加深对古代书籍的了解。

研究简帛格式有助于简牍帛书的整理、复原。出土的简册多因编绳的腐朽而散乱,帛书也因年代久远而残碎,“了解了古代简牍帛书制度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给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通过了解有关制度的规定,便于将零散的简牍明晰地根据长度、形制、格式、体例等分类归纳,并根据不同形制的简牍去确定其内容类型,复原编集,进一步研究”。^②

三、简帛格式研究概述

在我国,比纸更早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和缣帛。简帛作为书写材料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简帛格式对后世书籍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时间久远,以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籍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不是很了解了。汉唐人的著作与注疏里只是零星地记载了书籍格式的一些情况:《论衡·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春秋左氏传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唐代孔颖达正义“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唐代贾公彦疏“郑

①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4页,

② 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89页。

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今本误作‘尺二寸’,详阮元《校勘记》)。《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

汉代人尚能见到简帛实物,其著作里记载的简帛格式,可能是当时简帛书籍的忠实记录。汉代以后,简帛逐渐被植物纤维纸所替代,人们对简帛逐渐陌生,相对于汉代学者的记载来说,唐代及以后学者的记述已属“纸上谈兵”。明末清初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一“器用·书札”、①清代李惇《群经识小》卷四“论方策”、②汪继培《周代书册制度考》、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③叶德辉《书林清话》④等讨论古代书籍格式的著作,更是无缘于实际的简帛。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汉代记述及唐代注疏的基础上,基本上沿袭汉唐人的说法。这些著作详细地梳理了文献记载的简帛格式,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20 世纪初,敦煌汉简的发现带来了简帛格式研究方式的改变。学者研究简帛格式,可以将文献记载的书籍格式与简帛实物结合起来。在此之前,典籍里也提到了简牍的出土。大规模简册出土仅有晋代的一次,而晋去汉未远,当时尚未注意到简册格式。20 世纪简帛格式的研究,当首推西方学者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⑤可惜沙畹几乎没有利用出土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作对比。⑥ 国内学者较早研究简牍帛书格式的是王国维先生,其著作

① 方以智:《通雅》,光绪庚辰(1880 年)六月桐城方氏重刻本。

② 李惇:《群经识小》,道光五年(1825 年)安禺堂刻本(八卷)。

③ 汪继培:《周代书册制度考》、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载阮元《诂经精舍文集》第十一卷,嘉庆扬州阮氏刻本(十四卷)。

④ 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 9 月,第 9~16 页卷一“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

⑤ 冯承钧译,载《图书馆季刊》第 5 卷第 1 期,1931 年,第 47~65 页。

⑥ 参看风仪诚《再谈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形制》,2007 年 11 月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论文。

《简牍检署考》中文稿在1914年刊登于《云窗丛刊》。^①《简牍检署考》是这一时期研究简牍格式最重要的著作,书中总结简牍长度为“分数倍数说”,对后世影响极大:

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而五帝之书名“典”,则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其来远矣。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牍则自三尺(槩),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一均为二十四之分数,一均为五之倍数,此皆信而可征者也。^②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③傅振伦《简策说》^④都沿用此说。王国维之后,余嘉锡、^⑤原田淑人、^⑥劳干、^⑦黄盛璋、^⑧、黄文弼、^⑨陈槃^⑩

① 1912年,寓居日本的王国维撰写了《简牍检署考》,论文的初稿当时就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译成日文,刊登在京都文学会的杂志《艺文》第4、5、6号上。1912年5月31日,王国维将《补证》寄给铃木,所以《艺文》第6号上有《补证》一节。《简牍检署考》中文稿于1914年刊登在《云窗丛刊》。参看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简牍检署考》导言”第1页。《简牍检署考》,又载《王国维遗书》第9册(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

② 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第14、58页。

③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1~275页。原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6年。

④ 傅振伦:《简策说》,《考古》社刊第6期,1939年,第1~38页。

⑤ 余嘉锡:《书册制度续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39~559页。原载《文献特刊》,1935年10月。

⑥ 原田淑人:《中国古代简札的编缀法》,《东方学报》第6卷,1936年。

⑦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

⑧ 黄盛璋:《简牍以长短别尊卑考》,《东南日报》(上海)1948年4月7日第7版。

⑨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97~402页“第九节释简牍制度与书写”。

⑩ 陈槃:《三订先秦两汉简牍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4本第2分,1983年6月,第1~22页。

诸先生文都曾著文讨论简帛格式。《简牍检署考》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检署格式的研究,王国维先生结合出土实物对检署概念的界定、封检的封缄以及封检题署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前,除敦煌和居延等地出土零星古书类简牍外,出土简帛以文书、丧葬文书为主。虽有楚帛书的出土,但因为材料的限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①从实质上来说,这一时期简帛格式研究仍旧依靠传世文献资料,出土简帛的作用反而不大。

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M6出土汉简600余枚,内容是《仪礼》,为研究简帛格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陈梦家先生整理了这批材料,《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就是在整理武威《仪礼》汉简基础之上完成的。^②《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是继《简牍检署考》之后简牍格式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陈先生将简牍格式分为“材料、长度、刮治、编联、缮写、容字、题记、削改、收卷、错简、标号、文字”等内容。陈梦家先生所确定的简牍格式的框架,仍是我们研究简牍格式的基础。在国外,钱存训先生所著《书于竹帛》运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献两方面的材料,对中国古代书籍的产生与演进做了很好的研究,其中对简帛格式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③

① 20世纪初期仅敦煌出土几件帛书,都不是书籍,1942年子弹库帛书被盗掘出土,楚帛书于蔡季襄《晚周缙书考证》(1944年石印本)一书中发表,但因出土帛书资料的不足,学者对帛书格式研究仍停留在传世文献资料的整理阶段,如陈槃《先秦两汉帛书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6月,第185~196页。

②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9月,第53~77页。又收入《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91~315页。

③ 《书于竹帛》一书,英文初版印行于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原名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中文第一版于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订本由郑如斯教授增补,改题《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于1987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现题《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是中文第四次增订。参看《书于竹帛》“本书版次说明”。

7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简,以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的出土,为简牍格式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实物资料。台湾学者马先醒先生在《简牍学报》第7期发表了《简牍释义》、《简牍时代》、《简牍质材》、《笔削与汗青》、《简牍形制》、《简牍文书之版式与标点符号》、《篇卷与竹帛》、《简牍之编写次第与编卷典藏》等一系列文章讨论简牍格式,^①是继陈梦家先生之后对简牍格式的又一次全面总结。郑如斯、^②高大伦、^③薛英群、^④郑有国、^⑤马先醒、^⑥李均明、刘军、^⑦刘洪、^⑧胡平生、^⑨洪石、^⑩李零、^⑪冯胜君、^⑫

① 《简牍学报》第7期,1980年,第1~19、75~136页。

② 郑如斯:《从近年新出土文献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郑如斯、肖东发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6月,第257~266页。原载《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文件》,1979年。

③ 高大伦:《简册制度中几个问题的考辨》,《文献》1987年第4期,第247~262页。

④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第96~167页“第四章简牍制度”。

⑤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24~44页“第三章简册制度”。

⑥ 马先醒:《简牍制度之有无及其时代问题——附商王国维著〈简牍检署考〉》,《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第3~20页。

⑦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42页。

⑧ 刘洪:《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63~168页。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春之卷(总第19期),第122~126页。

⑨ 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74页。修改稿题为《简牍制度再研究》,见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简牍检署考》导言”第10~39页。

⑩ 洪石:《东周至晋代墓葬所出物疏简牍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1年第9期,第59~69页。

⑪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第135~165页“第四讲简帛的形制与使用”;《楚帛书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2版,第227~262页。

⑫ 冯胜君:《从出土文献谈先秦两汉古书的体例(文本书写篇)》,《文史》2004年第4期,第25~35页;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4月,第1~62页“一 形制篇”。

张显成、^①赵超、^②刘国忠、^③富谷至、^④耿相新^⑤诸先生都曾著文讨论简牍的格式问题。

近年来,简帛格式研究向纵深拓展。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先总结出土简帛的标题格式,然后据之纠正了一些有关简帛标题不确切的看法,并且利用睡虎地秦简标题格式校正了断简的拼接。^⑥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通过测量汉简体积、重量讨论了简牍的书写与收藏等问题。^⑦孙沛阳先生通过观察,发现了简册背划线,这对于简册的复原来说非常重要。^⑧李松儒先生通过对楚简抄手字迹的研究,考释楚文字,复原楚简的编联,拼合残断楚简。^⑨

最近,岳麓书院秦简、北京大学西汉简牍和秦代简牍、清华大学战国楚竹书相继入藏,里耶秦简、肩水金关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简牍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我们相信简帛格式研究的前景将更为广阔,必将成为简帛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①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08~220页“第三章简帛制度”。

② 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89~98页第二章“简帛的考古发掘、科学保护与对古代简帛制度的研究”第二节“古代简帛制度”。

③ 刘国忠:《古代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4月。

④ 富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35~63页“第三章木简与竹简”。

⑤ 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

⑥ 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2月。

⑦ 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23~40页。又见“简帛网”2008年4月5日,网络链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15。

⑧ 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449~462页。

⑨ 李松儒:《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指导教师:冯胜君教授。

第一章

简牍格式

第一节 简牍称谓、种类与 简牍材质

在我国,比纸更早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简牍被广泛使用:

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其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无疑是竹、木盛产于中国,就地取材,价廉而易得,正如纸草之于埃及、贝叶之于印度,因此被普遍采用作为书写的材料。^①

①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71~72页。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的起始时间,虽不能确定,但据文献: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可知早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简册。甲骨文“册”字写作:



《甲骨文合集》37429



《甲骨文合集》37428



《甲骨文合集》37386

金文“册”字写作:



父癸鼎



作父戊簋



父癸爵

①

“册”字,一般认为是竹木简编联之后的形象,也可说明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简册。^② 已发现的简牍,曾侯乙墓竹简为最早,属战国早期,迄今尚未发现春秋之前的简牍。简牍使用的下限,是在魏晋时期,这时植物纤维纸逐渐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① 以上三个“册”字见容庚编著《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月,附录上454、458、459。

② 殷商时期已使用简册,可参看郭若愚《试论殷代简册的使用及其他——释册、扁、聿》,《智龛金石书画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8~13页,此文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李学勤:《简牍帛书》,邓广铭主编:《中国历史研究知识手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77~278页;蒋红毅、陈抚生、张玉强:《试论殷代简册的使用》,《殷都学刊》1992年第2期,第11~14页;冯胜君:《出土材料所见先秦古书的载体以及构成和传布方式》,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第195~214页。也许简册出现得更早,李学勤先生说:“前些年,山东邹平丁公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文,有一个看来从‘册’的字,如果理解不差,说明相当夏朝初年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存在简册。”参看骈宇騄、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3月。

一、简的称谓、种类

“简”，就是一种狭长的竹木质的薄片状物(图 1.1.1)。① 此物在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名称，其中以“简”最为常见，如：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诗·小雅·出车》）②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简”或称“毕”：

简，谓之毕。（《尔雅·释器》疏云：“今简札也。”）

“简”或称“牒”：

简，牒也。（《说文解字》）

截竹为简，破以为牒。③（《论衡·量知篇》）

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汉书·路温舒传》）

《汉书·路温舒传》颜师古注：“小简曰牒，编联次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曰：“牒，小木札也。”）马王堆 M1 出土的遣册称一枚竹简为一牒：

右方胫勺、肱、取□六牒、卑匱四简二

马—88

右方苴五牒、资五

马—157

从马王堆 M1 竹简看，简文所谓之“牒”与出土的汉代竹木简没有

① 本书较为狭长的图片一律附在节末，下不予以注明。

② 文中所引例证，先贤的著作里已引用过，特此说明，下文同。

③ 李零先生认为此处的“牒”是指“最长的竹材”：“王国维以‘牒’为竹木简之统称，但《论衡·量知》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则‘牒’之本义当与‘断木为桀’的‘桀’相似，是指最长的竹材。”《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 126 页注 1。

大小差别。

“简”或称“札”，典籍中“笔札”常见。《说文解字》解释说“札，牒也”。古代学者多将文献记载之“札”注释为“木简之薄小者”：

上令尚书给笔札。（《汉书·司马相如传》）

颜师古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又见《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单行书写的木简也称“札”：

安汉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五月输

乙138.7, 183.2

□□如牒书到壹以广大札明书与烽

EPT59.132

陈梦家先生说“凡此以札、牒为短小的木简，是唐人之说，不尽合于汉制”。^①

文献记载有一种“两行”简：

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制度》）

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蔡邕《独断》）

王国维先生认为：

至狭牍之书，则容两行。《独断》云：“表文多以编两行。”

又云：“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隶书，尺一木两行。”^②

敦煌、居延出土的文书上记有“两行”简：

两行册

檄三

驩喜燧

札一比

八月己酉输

①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武威汉简》，第54页

② 王国维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第64页。